

专题

← (上接3版)

日本出版的《明治·大正·昭和翻译文学目录》(国会图书馆编,风间书房,1959)收有四万条书目,明治时期(1868—1911)就有近两千种。因而,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藤惠秀主编,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亦说:

西洋作家如 Jules Verne, Maupassant, Camille Flammarion, Allen Upward, Hermann Sudermann 等,通过梁启超、吴稚晖、鲁迅、包天笑等幼稚的译笔,从日译本重译过来,清末读者亦受落。

这样看来,现在很多专门研究汉语的欧化文体的著作等于是完全跳过这一环节,不去看梁启超,而直接跳到胡适。明明知道中国近代翻译的60%以上来自日语,却只强调仅占21%的欧美翻译。比如,吴稚晖译自俄国作家契诃夫《黑衣教士》的下述例子,实际上正是译自日人薄田斩云翻译的《黑衣僧》(《太陽》杂志十卷13—14号,1904.10.1—11):

① 随即启行,转向从前的恩人,又是第二个父亲,俗称义父,当时俄国著名园艺家白叔忒斯开所住的处在。(聽て自分の以前の恩人、且つは第二の親たる、當時、露國の園藝家として名を知られて居るペントスケー氏の處へ出かけた。)

② 那些生机勃勃的花草,被水浇灌了,湿气油然,四面散开浓香。(日は早や没せんとして、生々と、水を灌かれ、草花は、湿気ある、人を簾す様な香を发散して居る。)

例①中“处在”带有一个很长的定语,而且定语中还嵌入了一个介绍“恩人”情况的插入语,这种修饰结构的形式在以往的白话中是很难见到的,口语里更是根本不说的。汉语的“被”字句原有两个特点,一是通常只用于不如意的事情,而一般不用于如意的事情;二是句子的主语通常都是指人的,而很少是指物的。例②的“被”字句却都说的是如意的事情,且主语还是指物的名词,这样的“被”字句在以往的白话中也是很少见到的。这些都是语法上的所谓“外国语迹象”,也就是欧化的语法现象。

笔者现将日文附在中文例句后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作为典型的欧化语法所强调的两点:“处在”前所带的很长的定语和“被”字句的特殊用法,都是先反映在日语里加波

浪号的部分上,中文等于是日文的直译,也就是说,这种欧化现象完全是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

的确,我们看这个吴棹(1880—1925)经日文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半选自《太陽》杂志刊登的日译外国小说。比如吴燕的研究(《〈燈臺亭〉をめぐって》,《清末小説》第33号,2010)便是就其《燈臺亭》的翻译来厘清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和翻译上的问题点的,这里仅举该译本的成立始末:

1902年田山花袋以英译为底本翻译出《灯台守》,登载于《太陽》杂志

1903年馬場孤蝶译《灯台守》登载于《新小説》(明治三六·六)

浅野愚虚(和二郎)译《灯台守》登载于《文艺界》(明治三六·八)

1906年吴棹根据田山花袋的译本翻译成白话文《灯台守》登载于《绣像小説》

1907年馬場孤蝶译《灯台守》收入《泰西名著集》

1908年周作人又据美国人Curtis的英译本用文言文译成《灯台守》

1909年《灯台守》收入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

也就是说,吴棹的中文译文实际上是译自田山花袋的日文,而田山花袋则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一点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相似,并不是直接译自外文原文,而是经日文转译为多。《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也一样,即陈望道的初版也是译自日文的,而日文又是从英文转译的(拙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九十三期,香港中文大学,2006)。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研究汉语的近代文体的形成,日文翻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我们查检《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会发现其中共收入转自日译的欧洲文学翻译就有76种,如果加上登载在杂志上的单篇译作,数量远远不止于此。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科学的翻译,这种转译带来的文体上的影响就更不容忽视了。所以说,这种大量的日语文献、小说被译成中文,加之中文转译的日译西方小说,西化的汉语文体必然包含“日本”这一环节,无视这点便会出现很多偏颇的见解。

实际上,鲁迅强调的直译在这一点上是与日本欧化文体的周密性主张相一致的。既要输入新的思想内容,在感受文学的同时也要输

入新的表现法。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而要医这病,只能是“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即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73页)。这里说的新的表现法当是由直译而导入的,基于这些因素,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几点来探讨一下日语对汉语欧化文体形成的一些影响,比如英语定语从句中的关系代词能表述很长的内容,日语翻译后也照样,于是乎,留日作家的句子里也多出现长定语: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狂人日记》)

那时候的我,怕至少只有四岁吧。(郭沫若《我的童年》)

连买半斤黄酒的金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能忍此奢侈。(郁达夫《还乡记》)

前面黎锦熙举的“有字句”也是如此,应该是先由英语翻译成日语后再传到汉语里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上完朱德熙先生的最后一学期语法课后,回到日本写过一篇文章(《有+N+VP文のNの性格について》,《言語と文化》5号,1992)讨论这种“有+N+VP”句中N的特征,认为“有+名词”表示说话者为实现后面动作VP的一种态度(Modality),能担负这一名词的,近代新名词较多,如:

决心 意思 信心 勇气 精神 资格 条件 能力 关系 希望 把握 可能 机会 必要 责任 义务 权利 理由

所以,“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也可说成“回头我没有必要来接您的吧?”日语这种句式出现在明治后期的1894年前后,而中文的这种表述也多出现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显而易见。

同样,“非谓形容词”现象也是跟日语有着密切的关联,如:

この工場は国営である

这家工厂是国营

かれは男性である
他是男性

上述句子中,日语的“国营、男性”可以作谓语,而中文反倒不能,只能用于定语修饰名词,这类词在中文里增多也与日语新名词的增长同步。比如:“~式、~型、~性、~色、~等、~級”或“单~、双~、多~,有~,無~,不~,非~”的构词基本上都是这类,再有:

人工 交流 直流 全能 万能 兼職 裸体 立体 木質 專業 常務 刑事 民事 上位 下位 合法 高压 低压 中距離 短距離 長距離 長期 短期 定期 特種 局部 初步 積極 消極 大量 少量 高価 高度 高速 野生 新生 専用 日用 内服 前任 現行 固有 稀有 外在 内在 潜在 特定 特製 直属 直轄 直観 直接 間接 絶対 相对 自发 自動 人造 法定 電動 国营 国産 国立 私立 市営 私营 市立 公立 絶縁 臨床 啓蒙 唯物 唯心 保健 当時 臨時 適時 具体 積極 未滿 民主 國際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由接头接尾词所构成的新词为多。特别形成对义、类义的一组词,都是从日语转借到汉语里的。但从日语的形成也可看出西欧语言词汇体系的反映;

以主谓结构和状宾结构构成的词为多。即是句子的凝缩,也是日语构词的特征之一。

日语中的“具体、積極、未滿、民主、國際”亦被称作“造語専用”(野村雅昭《結合専用形態の複合字音語基》,《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一紀要》11,1998.6),即只能与其他名词复合构成一词,不能单独使用,这点与中文中的用法属同一性质。

最后我们再从构词法来看看纯粹来自日语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用“~盲”的词很多,如:“色~、雪~、夜~、文~、群~”等,这里只有“群盲”是遵循汉语构词法的,其他例子均来自日语,如“文盲”便是从日本借过来的。村上英俊《佛語明要》(元治元年[1864])里已有对译:

Ignoramment 不学ニシテ、文盲ニ。

Inorance 文盲。不学。

日文的“文盲”是“盲于文”的结构,可到了汉语里,因没有这一结构,硬是按照主谓结构来理解和分析。而且还可以将之发扬光大,如:“科盲、音盲、法盲”等,实际上是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另外构词结构的转换,也是引起词义变化的原因之一。如:在中文里本是动宾结构,不成词的,

但近代日语将动宾结构改为定中结构,便形成了近代的新词新义:

愛人(人を愛する→愛する人)、効力(力を効する→効く力)

再如:“持论”一词在《汉语大词典》(卷6,553页)里解释成“立论、提出主张”:

我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第一章)

而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持论”是来自日语的用法,是定中结构,即日语的连体修饰,正是相对后面的“时论”而言的,是“一贯的主张”之义。

另外,大原信一认为,本是日文结构的“文字改革,土地改革”等之所以能得以通行是缘于汉语中缺少 write > writer 这种行为名词(《中国語と日本語》,《言語生活》1974.3)。来自日语的“高利贷”即为行为名词,其他双音词结构现在成了最为通用的构词法之一:

~改造: 思想改造,城区改造,厂房改造,河道改造

~测验: 民意测验,心理测验,智力测验,素质测验

~革新: 技术革新,教育革新,材料革新,思想革新

~改革: 土地改革,文字改革,体制改革,政治改革

~培训: 技术培训,就业培训,英语培训,会计培训

~建设: 城乡建设,基本建设,工程建设,网站建设

实际上,我们看近代中文文体的形成不光是要看其欧化的程度,还应看日化的影响。汉语研究的话语权多出自留学欧美的学者,根本缺乏从日语看汉语的视角,所以,现代汉语中的许多现象也都一味地按欧美语言学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客观地、准确地描写出汉语的语言事实,这一点本来应该引起日本的中国语学专家的注意,但遗憾的是他们也多依照中国的语法学家的说法,近来才有内田庆市等先生开始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注意到日语本身对汉语的影响,他提出的途径就是“发自欧洲一经由日本一开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关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01)。我们如果基于这一思路来考虑中日之间的语言问题,或许很多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首先应该是留日学者的职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日本成城大学教授)